

参考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44期·
1957年4月13日·星期六
新华通讯社编印

约旦组阁和纳布西辞职的背景情况

【路透社安曼11日电】约旦国王侯赛因今天任命上院议员、前外交大臣哈利迪博士组织新政府。国王在解散了纳布西的内阁后不到24小时就请这位前外交大臣组织政府。

【美联社安曼11日电】据说，哈利迪星期四在组织约旦新政府工作上已告失败。消息说，哈利迪已经报告侯赛因国王说他无力组织一个内阁来代替纳布西首相的内阁。但是，这个消息还不能立即得到官方的证实。

【法新社安曼11日电】哈利迪今天同他的同事们整天举行会商，但是迄今还没有具体结果。

哈利迪是一个抱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巴勒斯坦难民，他在以前的几届政府中担任过几次大臣职务。他经常表示他要实施联合国决议的雄心。这个决议要求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返回他们在以色列的老家，并且赔偿那些不愿意回去的难民。这位奉命组阁的首相竭力反对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联合开发约旦河的约翰斯顿计划。

【路透社安曼11日电】支持纳布西的约旦政府的四个政党于今天举行会议，并发表声明指责政府的下台。

这四个党派是：国家社会党、阿拉伯复兴党（左翼），共产党和全国阵线，它们决定不参加下届政府。

四个政党发表声明攻击“帝国主义”和各种阴谋，并向约旦人民保证说，它们决心要消灭外国的势力，并同埃及和叙利亚结成联邦作为达到阿拉伯充分团结的第一步。

【合众社安曼11日电】纳布西的支持者在早些时候声明他们拒绝参加任何新政府。纳布西和他的合作者在约旦的由四十个议员组成的议会里占有整整一半的席位。有消息说，好些显要人物正在劝说纳布西参加有军队总参谋长诺瓦尔少将和曾任首相的约旦驻开罗大使穆尔基参加的独立政府。

来自贝鲁特的消息说，纳布西的国家社会党正在要求国王侯赛因先要接受一项四点纲领。

这四条就是：一，最终与叙利亚和埃及结成联邦；二，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是国家的主要敌人；三，接受人民的主权，而不接受王朝统治。四，从政府中撤消一切纳布西认为是反动的保守分子的职务。

【合众社华盛顿11日电】美国官员们往往有这样的看法：阿拉伯王国约旦能够渡过它目前的危机而不致遭到过去一年中人们预料它会遭到的瓦解的命运。

一位消息灵通的官员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也包括这样的可能性：侯赛因国王可能最后要求前首相纳布西——他的辞职是国王所要求并且接受的——再度出任首相。

消息灵通人士说，如果这位青年国王要求组织新内阁的别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的话，可能发生怎样的事。

外交界人士中间流传说，纳布西的辞职是他同国王之间交易的一部分。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侯赛因和他在约旦陆军中的主要支持者们对于内阁中有两名据认为是危险地亲共的阿拉伯复兴党阁员特别不高兴。

【合众社安曼11日电】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今天举行示威，抗议把亲东方的纳布西首相免职。在约旦河以西的约旦主要城市纳布鲁斯，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居民都涌到了街上。

纳布鲁斯的亲埃及情绪是最为强烈的。在今天清晨就开始举行示威的纳布鲁斯，没有发生严重的意外事件。纳布鲁斯的学生和来自附近地区的村民在街上游行，要求使被免职的首相复职。

他们举着反对西方和拥护纳布西的旗帜。

【法新社巴黎11日电】开罗电台报道，约旦驻埃及大使穆尔基在到达开罗的时候说：“约旦全境平静。”

【美联社纽约11日电】有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才造成约旦危机的爆发。这些因素据说是：

（一）纳布西内阁决定与苏联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这显然是与侯赛因国王所明确表示过的反对共产党渗入企图立场相背道而驰的。

（二）侯赛因想把邻国伊拉克拉入对付以色列的一个阿拉伯防御体系中，据说埃及总统纳赛尔则反对这一尝试。

（三）叙利亚人在进行一种实质上等于吞并约旦的活动，设法要把约旦拉入与叙利亚成立的一个联邦中。开罗消息表明，假如纳布西没有被侯赛因所黜免的话，本周末就会采取步骤来实现纳布西与反西方的叙利亚政权的协议。据消息说，叙利亚与纳布西的代表们所进行的会谈已经结束。

据这些人士说，侯赛因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是：当埃及武装部队缺乏良好组织的时候，一旦以色列发动进攻，约旦就可能陷于孤立的地位。据说纳赛尔对此提出了不同意的意见，认为他有充分的空运飞机和军用飞机，足以在约旦需要的时候向约旦提供任何援助而不必求援于伊拉克。

【美联社开罗11日电】“晚报”星期四说，纳布西辞职是帝国主义对积极的中立政策的一个打击。最左的开罗日报“晚报”说，纳布西辞职“不是像通常内阁更换那样的内阁问题，而是接触到自由阿拉伯政策的核心，积极中立与和平共处的核心的问题”。

【法新社大马士革11日电】纳布西的约旦政府的辞职今晨引起叙利亚报纸的注意，这些报纸对这个兄弟国家的局势严重复杂化感到不安。

唯一评论这个事件的亲社会党报纸“舆论报”认为纳布西政府的辞职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必定表现为一方面是国王、另一方面有军队支持的人民之间公开的斗争。

【合众社安曼11日电】在大马士革，埃及大使昨晚拜访了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消息灵通人士说，他们讨论了约旦的局势。他们又说，叙利亚支持纳布西，沙特阿拉伯支持国王，埃及企图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谨慎地走中间路线。

这里的政界人士指出，叙利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在约旦政治局势上发生的重大分裂可能危及阿拉伯对这个国家的财政援助。

【合众社华盛顿11日电】据这里的外交人士说，预料约旦国王侯赛因将立即向美国提出要求，要理查兹大使尽速访问安曼，讨论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些人士说，最近从安曼发出的外交电讯透露，侯赛因对于接受埃及和叙利亚的津贴来代替英国的津贴一事非常踌躇不决。侯赛因成功地使纳布西辞职一事是由于他得到约旦较为保守的分子的充分支持。

他们相信，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为了君主政体的原因将支持侯赛因，而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很可能支持纳布西。

美議員汉弗来鼓吹成立“中东开发局”

并叫嚷为此应把加沙地区国际化

【合众社纽约10日电】民主党参议员汉弗来今夜在美国一以色列商会第四届年餐会上发表演说时主张设立一个中东开发局；他说，这一机构成立以后，可能“打破中东地区积累的失望与仇视的僵局”。他说，中东是从事区域性开发的理想地区。他建议中东开发局不仅有这一地区的各国参加，而且有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一切国家参加。这一机构可以进行工程、贷款、进行科学研究的技术援助。

汉弗来说，为了成立中东开发局，必须考虑把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一个地区永久国际化。这样一个地带即使根据它本身的优点来说，也会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这样，埃及和以色列都有可能减少它们的军事开支了。

【美联社纽约8日电】两家纽约报纸星期一要求美国加强努力了解非洲，并且给予非洲实际的帮助，使它保持在共产主义阵营之外。

“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一个巨大的大陆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再不是‘最黑暗的’了。现在政治上和物质上都在进行巨大的改变。除非我们开始设法了解他们，否则我们将因近视而被可耻的敌人所玩弄。”

“纽约先驱论坛报”说，“不能再认为非洲是偏远的和神秘的大陆了，它过去是专供猎取巨兽的人、探险家和电影摄制者们活动的地方。国际共产主义认为非洲是一个‘首要目标’，它正在进行紧张的努力，使非洲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克里姆林宫，并且为了同样的目的来利用贫困和种族间的紧张局势。”

这两家报纸的社论都评论了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关于他最近到非洲旅行的报告。

美联社說印尼“雄牛师委员会”威胁中央

揚言要勾結外国石油公司夺取政府外匯

【美联社巴东11日电】中苏门答腊雄牛师委员会领袖们星期四暗示：他们会“采取激烈手段”，如果新内阁太向左转的话。

一位苏门答腊人说，“除非他们立即得到这些东西，不然人民会开始怀疑支持我们来反对政府是不是明智。”

虽则这个委员会的计划还处于讨论阶段，这里已暗示：它可能即将请求外国大石油公司不把款项付给雅加达。

美国的德士古石油公司每年约付给印度尼西亚二千四百万美元作为它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的外汇收入的一部分。另外两家公司巴格夫石油和美孚油公司, 根据合同规定在把石油运往国外以前必须要供应印度尼西亚国内消耗用的石油, 因此据说付得少一些。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11日电】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主席赞同新内阁。沙利尔在接见这里的“新闻报”记者的时候说: 尽管新内阁在法律上说不合宪法的, 但是, 苏加诺设法组成的这个内阁提供了有希望的前景。

沙利尔认为: 参加新政府的这些人都是“好公民”, 这就是说, 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在政治范围以内和以外的行动都是交代得过去的。

这位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袖在革命的最初几年曾经领导过这个共和国。他的党在1955年的选举中遭到惨败。

沙利尔同意朱安达总理所说的这句话: 他的内阁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沙利尔说: “印度尼西亚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大的, 现任的政府应该尽一切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编者注: 在这次倒阁过程中, 社会党是和马斯友美党站在一起的。沙利尔的这个谈话反应了同马斯友美党对新阁的态度有所不同。“新闻报”是在雅加达出版的荷兰文报纸, 它一贯采反共亲西方立场。)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11日电】日惹的欢迎俄国马戏团委员会已经对中爪哇的迪波内戈罗师司令官提出抗议, 因为日惹团的司令官和苏联马戏团演出。日惹军事司令部不允许苏俄马戏团在日惹城演出。

委员会在书面抗议中谴责日惹军事当局, 说他们这样做妨碍了实现政府的保持印度尼西亚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政策。这项书面抗议进一步说, 这种禁止是不符合最高司令官和迪波内戈罗师司令官当时的命令的精神。

在这方面, 日惹第十二团司令官阿里中校对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说, 禁止苏俄马戏团在日惹演出并不是基于政治方面的理由, 而是完全为了维持秩序。他又说, 苏俄马戏团并不是一个苏俄文化代表团。因此, 军事当局没有任何义务要允许他们演出。但是, 如果这个杂技代表团是作为文化代表团到日惹来的话, 就不会是这种情况。

研究印尼问题的美国人宣传说 印尼政治操縱在少数上层人物手中

【美联社纽约9日电】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两年研究这个国家的领导问题的麦斯伯格说, 印度尼西亚统治的中坚人物未能符合这个国家新的民主的需要。

麦斯伯格是纽约克尼克伯克基金的副研究员。他说, “印度尼西亚社会的中坚人物集团就是谈吐清楚、城市的、主要受荷兰教育的土著上层阶级, 它的最大和最有力的部分集中在首都雅加达。这些中坚分子组织政党和实行分裂, 赞成或反对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 组织政府和使内阁垮台, 而且一般地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这个拥有大概不超过二百人的最小核心的小集团, 具有的策略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的数目上或经济实力上的比例。”

麦斯伯格的报告说, 农村的态度仍然顺从独裁的统治, 和古时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时地方贵族政治掌握着政府的职权。

他说, 在革命的严重年月, 这一上层人物中最有力的人物就是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他问道: “没有年轻的领导人这一代的有效领导, 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这一代的情况如何呢?” 然后他回答说: “今天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政府里、军队中、私人企业和不同的政治党派中都已身居要职, 除了少数而外, 今天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阶层的人物中最走运的人了。他们大多数未能坚持住他们的生动的革命成绩, 而且看来也不能对他们的国家提供它所需要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领导。”

今天的上层人物遭到了内部倾轧和个人争雄的折磨。这个集团遭受了不稳定的痛苦, 对本身缺乏信心而且时常对它的方法和目标产生令人苦恼的不肯定态度。”

麦斯伯格指责说, 这个上层分子集团“尽管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大多数有势力的优秀分子拥有更高的智力和潜能”, 但是迄今未能满足独立政府的需要。不但未能把他们的品质带到政府中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在有势力的上层人物中, 有很多人把政府看成是促进他们党的利益或者他们自己的当前私利的工具。”

他说: “结果, 今天政府和有势力的上层人物是在权力真空中挣扎着, 缺少一种新的权威和内部纪律, 可是还不愿意放弃任何政治特权来促成新的权威。”

美密执安大学教授 谈我对亚洲中立国家的政策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编者注: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由美国“基督教科学协会”经办的晚报, 支持美统治集团政策, 势力很大, 对国外新教徒有较大的影响。它对国际形势常有一些独到的分

析。) 4月5日在“北京和莫斯科较量手段”的标题下, 刊载了一篇波士顿电讯, 报道了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艾伦·惠廷在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小组讨论会上关于我国对中立国家政策的演说。

艾伦·惠廷说, 北京争取亚洲各中立国家的时间比莫斯科要早得多, 作法也比莫斯科巧妙得多。北京对于国内宗教界采取的政策使得这些亚洲国家对共产党中国的印象比对苏联的印象好得多, 这是北京的政策同莫斯科的政策两个重要不同之点。

惠廷说, 这些不同的确表明北京可以而且的确是在摆脱它的共产主义的老大哥而独立行动。例如, 在中立主义问题上, 北京在八年以前开始攻击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未承担义务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阵营的走狗”。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北京便不再进行这种攻击了。

然而苏联却在奉行着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方针: 世界上只有两个阵营, 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或自由世界。这种说法认为, 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中间立场。北京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得到的经验使它渐渐趋向放弃两个阵营的说法, 而重视像印度这样的中立国的用处。

惠廷博士说, 北京在1954年10月正式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两个阵营的说法。北京的新分析把世界分成四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 帝国主义阵营, 已经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阵营, 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阵营。直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 莫斯科才正式接受这一看法。此外, 虽然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1955年12月的印度访问成为世界报纸的要闻, 但是这次访问还不能与同年春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亚非会议上取得的成功相比。

路透社在京记者报道我制酒业情况

【路透社北京7日电】(记者: 漆德卫) 现在, 共产党中国喝啤酒的人越来越多; 啤酒只是在本世纪初才由英国人和德国人传到中国。自从1952年以来, 每年的啤酒消费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而且生产计划规定今年还要大大增产。由于1956年年底全国各地增加工资, 人民有了较多的钱来花在奢侈品上; 至少在北京曾经有一个时期感到啤酒不足。

啤酒这种新近流行的情况标志着中国人的饮酒习惯改变的开始。城市工人都逐渐放弃了他们饮烈酒的习惯而喜好饮温和的酒和啤酒了。这种改变在目前还很微小, 主要只限于新的都市里的居民; 对于农民来说, 虽然有些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购买啤酒, 但是大多数农民仍然喜好自酿的谷酒和米酒。政府鼓励这种改变。他们认为这是节约谷类、充分利用产量充足的水果和葡萄的一个方法; 并且认为这种酒对饮酒者来说比烈性较大的、传统的酒类要好些。但是年老的人和农民们仍旧保持着饮用他们那种烈性的白酒的习惯。

这里的大多数外国人都比较喜欢喝黄米酒, 这种酒是热过的, 通常盛在小碗里面。在招待会上, 宴会上和正式的晚餐会上, 人们总是不停地“干杯”。在喝比较好的米酒的时候, 真正会喝酒的行家是对这种习惯感到遗憾的。他们说, 华东浙江省绍兴出产的酒、特别是著名的香雪酒是应当仔细品味的, 不应当一口就喝干。

绍兴县的农民仍然制造着享有中国最好的酒的盛名的女儿红。在女儿降生的时候, 农民们酿制几缸这样的酒, 把它们埋在地下, 等到她出嫁的日子才拿出来。共产党政府的政策是要改良啤酒和葡萄酒, 同时继续生产这些传统的酒类。香槟酒虽然比苏联的大多数香槟酒要好。然而质量仍然很差。但是现在正在酿制一种味道还不坏的甜味的苦艾酒, 市场上正在出售着一些相当可以的中国利久酒。为了改良质量, 现在正在成立一个品评酒的组织, 可能还会派受过训的人员到国外去学习。在中国, 火酒和啤酒征收的捐税都相当重, 但是对于农民经营的私人酿酒设备则不征税。

喝这些外国式的酒的主要是外国人, 或者是在举行招待会和宴会的时候。这些外国式的酒, 有些输出到东南亚去; 中国官员们说, 其他共产党国家对中国出产的酒很感兴趣。但是, 虽然中国人都很欣赏他们自己的酒, 然而他们一般都喝不多。他们最喜欢的饮料仍然是绿茶, 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喝着, 而且在招待客人或举行会议的时候也总备有绿茶。

【合众社香港8日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加紧他们的提倡节育的运动, 设法解决人口增长太快的课题。事实是这样的, 共产党中国的人口是在迅速地增长, 据估计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万人。由于中国今天有六亿人口, 因此, 它在二十五年或是三十年之内就将面临到必须供养十亿人的食住的前途。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李德全女士承认说, 许多农民不是不赞成节育就是不了解节育。在城市妇女中间几乎也同样程度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李德全女士在最近的演说中例举了上海一家纺织工厂的例子, 这个工厂有七千个男女工人。她说, 在过去七年之中, 这个工厂的女工生了七千个小孩。她警告说, 除非实行有计划的生育, 否则共产党中国就不能“使自己摆脱贫困和走向繁荣和富强。”

这和苏联所需要的是恰恰相反的。苏联鼓励它的人民增加人口。中国共产党人认为, 由于经济方面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必须节育。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可能是增加的, 但是, 它增长的速度还不足以应付迅速增长的人口出生率。

英女王遨游巴黎城 十七世紀盛典重现 法总统晚会“忆当年” 帝国主义好景不再

【法新社巴黎10日电】具有悠久历史的卢夫宫博物馆今晚重新成了皇宫，这是由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出席了为他们举行的国宴，随后又出席了法国政府的招待会。

轻音乐在走廊里回响，二百一十位贵宾谈笑风生，光彩夺目的长衣拖地沙沙作响。为招待会准备了三个大餐桌，上面堆积了五千份三明治，八千份小点心，六千块酸面点心，三千份水果，一千五百份鹅肝甜饼，成千份其他可口的快餐和一百夸冰淇淋。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卢夫宫门口受到总理摩勒，外交部长比诺和国民教育部长的欢迎。戈蒂总统在德农走廊的入口处迎接他们。一列像五光十色的雕像的共和国卫队，端着军刀。当他们一群人走向大厅的时候，卫队们随着军队进行曲的节拍举刀致敬。十二个喇叭奏出了嘹亮的号角声，戈蒂总统停下来作为引导女王参观博物馆的向导。

当客人们在桌旁站定位置的时候，王室一行人观看了特地为他们取来的卢夫宫的油画杰作。然后女王和亲王随着由四个小提琴，一个中提琴，一个大提琴和一个最大提琴演奏的“舞曲”的声音进餐。进餐的时候所有的音乐都是十七、八世纪的。

迪安那神像复盖着花朵，墙上和窗子上都挂着蓝色的帷幕，柱子之间则挂着长长的，很薄的十八世纪的挂毯。女王和总统后面藏着一群始终在场的侦探，红外线的电炉温暖着这个通风的卢夫宫，一百个侍者和三十个厨司轮番在附近的厨房中劳作。

夜游塞纳河盛况空前
王夫妇乘着一艘灯火辉煌的游艇驶过塞纳河的时候，河的西岸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联欢会，使得这位来访的女王和五十万见过世面的巴黎居民眼花缭乱。

就其盛大、隆重和五光十色而论，这个城市是盛况空前的。在宽达数英里的露天舞台上，穿拿破仑时代服装的掷弹兵和穿路易十五时代服装的骑兵同穿着民族服装跳着舞的乡下人、杂技演员、魔术演员、男歌手和卖花女混杂在一起。

这是一次只有跳舞的通宵联欢，联欢在格林威治时间十九时三十分开始，女王夫妇在戈蒂总统陪同下，登上了国家游艇在塞纳河上巡游。

女王在笛声中登上了游艇，她轻巧地走上了复盖着的甲板，坐在船尾上的一个像是玻璃笼里面的座位上。这很像供一位仙后坐的光辉灿烂的宝座。当她出现的时候，群众高呼“女王万岁！”

码头上闪烁着数以千计的探照灯和反光灯发出的光芒，便巴黎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物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荣誉勋位宫前面，站着三排帝国掷弹兵，他们活像装在一个盒子里的锡制的士兵一样，这个盒子的盖就是巴黎的屋顶。

在杜伊勒花园附近的右岸上，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旗帜的飘扬，旗帜的边是白的，上面有金色的花，再过去就是王室的骑兵了。

杂技演员和魔术演员同一个即席演出意大利式喜剧的剧团轮流表演。

然后巴黎圣母院——世界著名的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带着一种不寻常的面貌出现了，从它的彩色玻璃窗里面透出了光辉，它的钟声嘹亮地响着。

管乐器大声地演奏起来，一百五十个穿着白袍的歌童拉高了嗓子唱一首十五世纪的赞美诗，扩音机把歌声传播到水面的对岸。在岛屿的尽头，巴黎水上救火队用水龙喷出水柱，表示皇家艇队将进行一场花色表演了。结果呈现了一幅由八万盆各种水仙花、郁金香和绿草组成的鲜花图画，这一切好像成为一个艳丽的花市。

约这艘船回过头来时，从亚历山大第三号桥和其他地方放出了巴黎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最蔚为奇观的烟火。在最后一阵火光中出现了烟火中从来没有用过的紫罗兰色。

这次被称为“回忆当年”的盛会在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一点前不久结束。晚上最后一个节目是英国大使馆中举行了招待戈蒂总统的招待会。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論資本主义思想残余問題

【本刊讯】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在今年第三期发表了斯·卡瓦列夫写的“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及其克服的方法”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肯定了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思想意识中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它的根源是社会意识落后于存在的发展和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同时，还必须承认在目前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水平上，还存在若干资本主义制度的“痕迹”；几千年私有制度所形成的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未完全消除，它们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起着不良的影响。因此，作者认为克服人们的落后思想不能光依靠教育措施，而且有赖于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全力扩大群众为共产主义斗争的社会实践来改造他们的思想。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卡瓦列夫的文章说，在一部分苏维埃人中间，不仅是老一辈而且也在生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部分青年人中间，在对社会公有制和劳动方面，对民族相互关系方面，以及在生活和家庭方面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残余的旧意识。卡瓦列夫批评了过去许多宣传共产主义教育的文章和小册子的观

点，它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旧的观点只是意识落后于存在和外界敌对思想的影响下才存在的，因此提出克服这些旧观点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教育措施，而不谈或很少提到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并全力扩大群众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社会实践来作为改造他们意识的决定性手段。

卡瓦列夫指出，在对待苏维埃社会现实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种是由于苏联人民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一部分人中间就产生了粉饰苏维埃现实的倾向，认为目前苏联的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可能支持那些落后观点的任何东西；另一种是有一些人企图把部分苏联公民中存在的有时甚至比较严重的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落后观点，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人中特别是某些作家在解释官僚主义偏差时就抱有这种企图，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某本规律同苏维埃现实中旧制度的残余混淆起来，因而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基础的诽谤。

卡瓦列夫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根源是社会意识落后于存在的发展，也肯定了落后意识的另一个根源是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但是他认为意识落后于存在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尚不能完全阐明落后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甚至有时候这种观点反而加剧的事实。例如革命后初期还存在说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制度，资本家有权占有工厂，没有资本家就无法办事的概念，这是意识落后于存在的表现。但是一当消除了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没有资本家，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成就，这种概念就完全消失了，任何敌对的宣传都不可能说服苏联人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象贪财图利，为了个人利益进行欺骗等等违反公共利益的这些现象还远未消失。这是因为几千年私有制存在过程中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要在三、四十年间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若干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现象在苏维埃现实中尚未被彻底根除，它们对人们意识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

作者说，这些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现象有以下几方面：

(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的条件下，“按劳取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可能的先进的也是平等的分配原则。但是人们在体力发展、能力、技艺方面有差别，劳动的质量不同因而人们取得的报酬也不一样。甚至在同等的劳动质量和数量而取得相同的报酬时，由于家庭状况不同，家庭成员人数不等，个人兴趣爱好不同，人们满足自己需要的程度也就不同。马克思和列宁把这种类型的不平等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还不能保证完全消除在满足物质需要和旧社会的其他“痕迹”中的差别，这些“痕迹”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并正在引起落后观点的滋长。

又如许多部门的生产机械化程度还不充分，工作时间的缩短不够多，还不能一下子把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人们还不是经常能按其所好选择职业，所有这些都可能并且正在使一些人滋长着对待劳动的落后观点，因此现在仍然有逃避体力劳动的现象。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痕迹”（这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充分有关）会引起个人主义倾向，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滋长贪财和利己主义的动机。

(二) 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必然产生违犯社会主义利益的落后观点。例如缺乏从物质上关心劳动，平均主义和工资差额的不正常现象就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劳动纪律松弛，缺勤，向上爬，官僚主义等等。这些不良现象的加剧同社会主义制度无关，而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放松对不良倾向作斗争有关。国家和社会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也引起推诿责任和缺乏主动精神等这种不良倾向。

(三) 人的意识、观点和精神面貌是外界各种不同现象对人影响的结果而形成的。因此影响人们行为的除经济因素以外，还有教育的因素，以及人们斗争的目的怎样和对这个目的的认识程度，国家和社会保护公共利益的程度，对违反社会利益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认识程度等等因素。例如，对儿童的不正确教育可能对它们产生某些不良的品质，如利己主义，游手好闲、说谎、放荡等等；相反地正确的教育就会产生社会主义道德的良好品质，如集体主义，爱好劳动，诚实等等。又如为群众所理解的伟大而崇高的目的可以帮助人们克服最大的物质困难和奋不顾身地为之而进行斗争。又如对公共财产的保存没有监督，偷窃的也可逍遥法外，那么就可能使某些原来是正当的人去盗窃国家财产；相反地如果国家制度严密，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对公共财产实行严格监督，加以社会舆论的影响，这就可以阻止那些甚至是惯于损害公共利益的人的行动。

苏“共产党人”杂志批評“历史問題”杂志 对批判个人崇拜的不正确理解

【本刊讯】苏联最近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登载了一篇社论——“在历史科学中严格遵守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批评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对批判个人崇拜有不正确的理解。

这篇社论说，“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的工作犯了许多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严重错误，主要的错误首先是对于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的政策作了不正确的理解。这个杂志的一些工作人员被追求廉价的声誉弄糊涂了。他们在实质上用自由主义的态度来解释党的政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质上被解释成对党和人民的思想敌人“缓和”斗争的方针。“历史问题”杂志常常用客观主义的态度来代替对历史问题的真正科学的阐述。它脱离了列宁主义科学中的党性立场，表现在一些编辑部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

领导人员对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许多主要问题上的原则分歧采取了抹杀的错误态度，缓和了对孟什维克及其随从者机会主义政策的批评。个别文章在对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的掩饰下，企图突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作用，客观主义地解释党内思想政治斗争的问题。

社论还说，“历史问题”杂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1905年2月起义中夸大了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没有说明孟什维克的破坏作用；二，在1917年革命中夸大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弱点，把党当时的立场和加米涅夫机会主义混为一谈。似乎斯大林也有加米涅夫的观点；三，从1917年2月到列宁回国这一段时期内，对党的活动仅谈到党的失策和错误；四，在揭露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反动理论的时候，把这些学者的反动历史概念和不尊重遗产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五，过分强调了西方科学和社会思想对俄国的影响，减弱了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社论在分析了这些错误后写道，只有既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又和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后果作斗争，发展历史科学才有可能；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够获得成果，完成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路透社就阿政府代表团訪苏

企圖挑撥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11日电】南斯拉夫官员今天预料，随着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最高级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南关系会进一步尖锐化。阿尔巴尼亚在克里姆林宫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新的思想争端中起带头作用。

南斯拉夫权威人士早就为上个月匈牙利总理卡达尔访问莫斯科时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尖锐的批评所激怒。他们说，他们充分预料，阿尔巴尼亚人的访问，会变成重新批评南斯拉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场合。

阿尔巴尼亚在报纸和公开抨击南斯拉夫的运动中特别积极。自从匈牙利起义以来，这个运动在东欧没有中断过。在谢胡和霍查前往莫斯科之前不久，最近的阿尔巴尼亚抨击把南斯拉夫和“帝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并且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是“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沙文主义”。

南斯拉夫官员们说，阿尔巴尼亚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否会被允许变成“反南大会”这一点，将是他们同苏联之间的未来关系的试金石。

南斯拉夫官员们坚决相信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攻击，是在克里姆林宫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贝尔格莱德的某些官员说，他们担心阿尔巴尼亚可能加紧它的这种运动，甚至可能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境发动挑衅事件。

同这种忧惧同时，有些南斯拉夫人士还担心克里姆林宫可能对纳吉进行“公审”。纳吉曾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内避难过一个时期。这些人士认为，对被苏联领袖们称之为“叛徒”的纳吉的审判必然带有反南斯拉夫的性质。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地拉那10日电】阿尔巴尼亚报纸“人民之声报”今天刊载了一篇谈论南斯拉夫报纸毁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文章。这家报纸提到在接近三月底的时候在南斯拉夫报纸“战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所谓“毁坏”，塞尔维亚的和门的内哥罗的军人的“坟墓”的问题。

“人民之声报”写道，为了鼓动南斯拉夫人民反对我们的情绪，“战斗报”这次利用了死人。除了粗野的话和据说是由从来没有到过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记者发现的“事实”以外，这篇文章还附有四张不说明任何问题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任何有一些树或灌木的地方都可以拍摄的。不幸这些文件一点也没有起着他们所想要起的作用。用来说明所谓“坟墓被毁坏”问题的全部材料完全是捏造的，“战斗报”提出这个问题的唯一目的，正如其其他许多情形一样，是要诋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毒害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说明，这家报纸再没有地方可以依靠，而且不能回答阿尔巴尼亚报纸谴责南斯拉夫领导的修正主义态度和谴责他们干涉我国内政时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因而它就无中生有地捏造问题。

卡德尔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分配問題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发展在过渡时期不能同时造成一种完善的、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他又说，但是，主要的是，法律制度正在以一种既不能容许停顿也不能容许发生物质和政治困难的速度在变化。

卡德尔是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样说的。这次会议上有人问到法律方面某些重大的任务以及在南斯拉夫进一步建立政治制度的问题。他的演说是在一家社会和法律科学杂志“文件汇集”的最近一期上发表的。

卡德尔强调指出：南斯拉夫经济基础本身变化得很快，在这种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他又着重说明：主要的事情是不要死板地固守某一个时候所创造或继承的制度，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改变它们。

卡德尔说，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应该同生产关系取得一致的关于国民收入和剩余产品的分配制度。在一个刚刚开始发展和

仍然存在旧的社会关系的因素和残余的年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个问题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和经常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同时迟迟不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从物质或政治的观点来看，都会造成很大的害处。

卡德尔继续说道，在过去几年中，通过时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愈来愈大的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有非常显著的高涨，而在行政因素仍然起重要作用的分配制度的改变方面，则做得要少得多。卡德尔强调，在这方面现在应当更向前一步，使经济的计划工作获得基本的一致，从而使经济发展获得稳定，并且更一贯地实施社会主义的对工人按劳计酬的原则。

卡德尔在强调了这种过程不能一夜之间就实现以后说，应当确定一个明确的运动方向，计划经济和法律制度应当建立得能使这个运动尽可能自由地展开。他认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不必是国家——就是它的行政机构——，而应是管理生产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是在一个统一计划的范围内作为这个社会的指导机构而起作用的。这个社会计划在满足共同的社会利益的同时，应当根据一项固定的经济政策全面分配社会基金。有了这种管理经济的制度，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将在全国平等条件下，由于在使企业有尽可能好的管理方面有所贡献，由于参加工人委员会、公社和较高级的社会机构，他们在分配工作中起坚决的作用。

卡德尔说，如果正确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的话，那就会更好地确定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法律地位。在这方面，特别的问题是企业和公社之间关系的问题。用卡德尔的话来讲，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应该意味着企业屈居公社之下。公社不是企业的一个集团，而是人的一个集合体和表现他们相互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它的收入应该依靠公民的个人收入，在这个范围内它应该影响剩余劳动的分配，而不是影响企业的经济政策。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个人收入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和对一切都平等的条件下增加公社收入，这应该是南斯拉夫社会制度发展的方向。按照这些方针，对个体生产者和公社都能够一贯地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它还会保证企业不仅仅对于行政机构而且对于公社的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不可缺少的独立性。

卡德尔指出这种社会统计和监督的重要意义，他说这个问题要求建立一个单一的自治组织，一个“社会记帐员和出纳合为一体”的组织，它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但是一经发现不合法的行动，它可以过问每一个经济组织的事务和提出公诉。在行政机关被直接要求干预的案件中，这个组织应该是行政机关弄清情况的工具。

卡德尔还说到需要建立一个监督地方自治政府，它的附属机关和组织以及行政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的合法性的监督机构。他认为，这应该是一定司法机关的职权，它可以取消一切不合法的决定。

卡德尔最后说，如果它们能使这两个工具——社会统计和监督——巩固地建立起来以及时行动的合法性实行监督，我们也可以在工人委员会和公社中采取更大胆的步骤来发展自治。

法新社就苏波捷领导人訪华

評我国同兄弟国家之間的关系

【法新社巴黎11日电】共产主义世界最高级显著人士相继前往北京，继西罗基之后是西伦凯维兹，不久即将轮到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这些会见证实了中国对于欧洲事务——特别是在周恩来访问东欧的时候——所表现的兴趣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所起的调解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预定访问华沙和周恩来预定访问贝尔格莱德，将对中国所起新作用提供更加明显的证明。这就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于是，国际舆论再次注意的是中国将朝哪个方向施行影响？

这是一个事实：毛主席决定选择哥穆尔卡的波兰来进行自从1949—50年访问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正是他在国内表明态度支持政权扩大自由主义化的时际。不过，要是因此，就认为中国打算领导一个反对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运动，那就错了。

要相信这一点，只需读一读中捷和中波会谈公报就够了，因为公报相反地着重指出必须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谴责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从而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民族共产主义。

极为可能，伏罗希洛夫在北京访问的时候，将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因此，华沙将只是以苏联为主要目标的一次旅行中的一个阶段。那么，显然——如果中国过去的态度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北京绝不想脱离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在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是中国所不可缺少的。不过，中国所发挥的符合它的民族传统的积极调解作用可能变成一种仲裁作用。渐渐地，不露骨地，中国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苏联虽然还掌握着共产主义集团思想领导权，但是中国在现在就已经在外交方面同苏联处于平等地位。

正当中在苏维埃集团内部的作用日益扩大的时候，它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在演变中。美国尽管始终坚决拒绝予以外交承认并且阻止它进入联合国，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承认：灵活处理目前限制着对华贸易的规则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将因而摆脱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它所受到的事实上的封锁。

【合众社华盛顿11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共产党中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于9月访问莫斯科和华沙。

这些人士说，毛泽东已经接受了西伦凯维兹总理星期二在北平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向他提出的邀请。

(上接第三版)

领导人员对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许多主要问题上的原则分歧采取了抹杀的错误态度，缓和了对孟什维克及其随从者机会主义政策的批评。个别文章在对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的掩饰下，企图突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作用，客观主义地解释党内思想政治斗争的问题。

社论还说，“历史问题”杂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1905年2月起义中夸大了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没有说明孟什维克的破坏作用；二，在1917年革命中夸大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弱点，把党当时的立场和加米涅夫机会主义混为一谈。似乎斯大林也有加米涅夫的观点；三，从1917年2月到列宁回国这一段时期内，对党的活动仅谈到党的失策和错误；四，在揭露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反动理论的时候，把这些学者的反动历史概念和不尊重遗产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五，过分强调了西方科学和社会思想对俄国的影响，减弱了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社论在分析了这些错误后写道，只有既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又和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后果作斗争，发展历史科学才有可能；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够获得成果，完成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路透社就阿政府代表团訪苏

企圖挑撥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11日电】南斯拉夫官员今天预料，随着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最高级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南关系会进一步尖锐化。阿尔巴尼亚在克里姆林宫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新的思想争端中起带头作用。

南斯拉夫权威人士早就为上个月匈牙利总理卡达尔访问莫斯科时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尖锐的批评所激怒。他们说，他们充分预料，阿尔巴尼亚人的访问，会变成重新批评南斯拉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场合。

阿尔巴尼亚在报纸和公开抨击南斯拉夫的运动中特别积极。自从匈牙利起义以来，这个运动在东欧没有中断过。在谢胡和霍查前往莫斯科之前不久，最近的阿尔巴尼亚抨击把南斯拉夫和“帝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并且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是“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沙文主义”。

南斯拉夫官员们说，阿尔巴尼亚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否会被允许变成“反南大会”这一点，将是他们同苏联之间的未来关系的试金石。

南斯拉夫官员们坚决相信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攻击，是在克里姆林宫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贝尔格莱德的某些官员说，他们担心阿尔巴尼亚可能加紧它的这种运动，甚至可能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境发动挑衅事件。

同这种忧惧同时，有些南斯拉夫人士还担心克里姆林宫可能对纳吉进行“公审”。纳吉曾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内避难过一个时期。这些人士认为，对被苏联领袖们称之为“叛徒”的纳吉的审判必然带有反南斯拉夫的性质。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地拉那10日电】阿尔

阿报对南又有批评

巴尼亚报纸“人民之声报”今天刊载了一篇谈论南斯拉夫报纸毁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文章。这家报纸提到在接近三月底的时候在南斯拉夫报纸“战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所谓“毁坏”，塞尔维亚的和门的内哥罗的军人的“坟墓”的问题。

“人民之声报”写道，为了鼓动南斯拉夫人民反对我们的情绪，“战斗报”这次利用了死人。除了粗野的话和据说是由从来没有到过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记者发现的“事实”以外，这篇文章还附有四张不说明任何问题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任何有一些树或灌木的地方都可以拍摄的。不幸这些文件一点也没有起着他们所想要起的作用。用来说明所谓“坟墓被毁坏”问题的全部材料完全是捏造的，“战斗报”提出这个问题的唯一目的，正如其其他许多情形一样，是要诋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毒害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说明，这家报纸再没有地方可以依靠，而且不能回答阿尔巴尼亚报纸谴责南斯拉夫领导的修正主义态度和谴责他们干涉我国内政时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因而它就无中生有地捏造问题。

卡德尔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分配問題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发展在过渡时期不能同时造成一种完善的、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他又说，但是，主要的是，法律制度正在以一种既不能容许停顿也不能容许发生物质和政治困难的速度在变化。

卡德尔是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样说的。这次会议上有人问到法律方面某些重大的任务以及在南斯拉夫进一步建立政治制度的问题。他的演说是在一家社会和法律科学杂志“文件汇集”的最近一期上发表的。

卡德尔强调指出：南斯拉夫经济基础本身变化得很快，在这种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他又着重说明：主要的事情是不要死板地固守某一个时候所创造或继承的制度，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改变它们。

卡德尔说，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应该同生产关系取得一致的关于国民收入和剩余产品的分配制度。在一个刚刚开始发展和

仍然存在旧的社会关系的因素和残余的年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个问题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和经常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同时迟迟不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从物质或政治的观点来看，都会造成很大的害处。

卡德尔继续说道，在过去几年中，通过时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愈来愈大的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有非常显著的高涨，而在行政因素仍然起重要作用的分配制度的改变方面，则做得要少得多。卡德尔强调，在这方面现在应当更向前一步，使经济的计划工作获得基本的一致，从而使经济发展获得稳定，并且更一贯地实施社会主义的对工人按劳计酬的原则。

卡德尔在强调了这种过程不能一夜之间就实现以后说，应当确定一个明确的运动方向，计划经济和法律制度应当建立得能使这个运动尽可能自由地展开。他认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不必是国家——就是它的行政机构——，而应是管理生产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是在一个统一计划的范围内作为这个社会的指导机构而起作用的。这个社会计划在满足共同的社会利益的同时，应当根据一项固定的经济政策全面分配社会基金。有了这种管理经济的制度，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将在全国平等条件下，由于在使企业有尽可能好的管理方面有所贡献，由于参加工人委员会、公社和较高级的社会机构，他们在分配工作中起坚决的作用。

卡德尔说，如果正确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的话，那就会更好地确定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法律地位。在这方面，特别的问题是企业和公社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用卡德尔的话来讲，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应该意味着企业屈居公社之下。公社不是企业的一个集团，而是人的一个集合体和表现他们相互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它的收入应该依靠公民的个人收入，在这个范围内它应该影响剩余劳动的分配，而不是影响企业的经济政策。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个人收入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和对一切都平等的条件下增加公社收入，这应该是南斯拉夫社会制度发展的方向。按照这些方针，对个体生产者和公社都能够一贯地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它还会保证企业不仅仅对于行政机构而且对于公社的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不可缺少的独立性。

卡德尔指出这种社会统计和监督的重要意义，他说这个问题要求建立一个单一的自治组织，一个“社会记帐员和出纳合为一体”的组织，它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但是一经发现不合法的行动，它可以过问每一个经济组织的事务和提出公诉。在行政机关被直接要求干预的案件中，这个组织应该是行政机关弄清情况的工具。

卡德尔还说到需要建立一个监督地方自治政府，它的附属机关和组织以及行政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的合法性的监督机构。他认为，这应该是一定司法机关的职权，它可以取消一切不合法的决定。

卡德尔最后说，如果它们能使这两个工具——社会统计和监督——巩固地建立起来以及时行动的合法性实行监督，我们也可以在工人委员会和公社中采取更大胆的步骤来发展自治。

法新社就苏波捷领导人訪华

評我国同兄弟国家之間的关系

【法新社巴黎11日电】共产主义世界最高级显著人士相继前往北京，继西罗基之后是西伦凯维兹，不久即将轮到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这些会见证实了中国对于欧洲事务——特别是在周恩来访问东欧的时候——所表现的兴趣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所起的调解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预定访问华沙和周恩来预定访问贝尔格莱德，将对中国所起新作用提供更加明显的证明。这就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于是，国际舆论再次注意的是中国将朝哪个方向施行影响？

这是一个事实：毛主席决定选择哥穆尔卡的波兰来进行自从1949—50年访问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正是他在国内表明态度支持政权扩大自由主义化的时际。不过，要是因此，就认为中国打算领导一个反对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运动，那就错了。

要相信这一点，只需读一读中捷和中波会谈公报就够了，因为公报相反地着重指出必须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谴责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从而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民族共产主义。

极为可能，伏罗希洛夫在北京访问的时候，将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因此，华沙将只是以苏联为主要目标的一次旅行中的一个阶段。那么，显然——如果中国过去的态度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北京绝不想脱离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在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是中国所不可缺少的。不过，中国所发挥的符合它的民族传统的积极调解作用可能变成一种仲裁作用。渐渐地，不露骨地，中国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苏联虽然还掌握着共产主义集团思想领导权，但是中国在现在就已经在外交方面同苏联处于平等地位。

正当中在苏维埃集团内部的作用日益扩大的时候，它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在演变中。美国尽管始终坚决拒绝予以外交承认并且阻止它进入联合国，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承认：灵活处理目前限制着对华贸易的规则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将因而摆脱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它所受到的事实上的封锁。

【合众社华盛顿11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共产党中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于9月访问莫斯科和华沙。

这些人士说，毛泽东已经接受了西伦凯维兹总理星期二在北平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向他提出的邀请。